DOI:10.6249/SE.202012_71(4).0031　收稿日期：2020/8/12　修訂日期：2020/9/10　接受日期：2020/12/21

學生出現行爲問題時，誰該負責任

傅嬿臻*　研究生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

「鈴……鈴……鈴……」小明媽媽接起手機，手機那頭傳來女性的聲音：「您好，這裡是〇〇國小，我是小明的班導師，請問是小明的媽媽嗎？」小明媽媽壓低聲音的說著：「我就是，老師有什麼事嗎？我現在上班中，可以長話短說嗎？」電話那頭的班導停頓了三秒鐘接著說：「是這樣的，小明被同學指控偷別人的錢包，後來和其他同學打了起來，現在要麻煩您來學校一趟。」

小明的媽媽趕到學校，聽完班導師解釋衝突發生的過程後，回應一句教師常聽見的質疑：「老師，我們家小明平常在家都很乖，怎麼來到學校就變了樣？他是不是在學校交到壞朋友？」

壹、學生在學校犯錯時，誰該負責

學生在學校犯錯時，家長除了頭痛之外，也不禁會疑問：「為什麼孩子的行為在學校與家庭間會出現這麼大的差異？」想到最終都會歸因於「交到壞朋友」、「別人帶壞他」。但除了壞朋友這個選項外，還有更值得思考的問題，儘管家長自認了解自己的孩子，但隨著孩子在學校的時間只會越多，家長也越難掌握孩子在學校的一舉一動，了解孩子「在家」是什麼樣子，但是了解孩子在「學校」的樣貌嗎？當孩子犯錯時，有些家長會將責任都推給學校，但其實孩子犯錯時，父母和學校都應該負責。在 Bronfenbrenner（1977）生態系統理論中強調：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發展是受生物因素及環境因素交互影響。生物因素是自然生態環境，環境因素則由兒童的生活環境推廣至外在的世界環境，這些環境可分為四層：微觀系統（家庭、學校）、中介系統（家庭、學校、社區之間的聯繫與相互關係）、外在系統（兒童未直接參與，但影響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因素）、

*本篇論文通訊作者：傅嬿臻，通訊方式：jec2508@gmail.com。

宏觀系統（文化、政治）。Bronfenbrenner（1979）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與環境是一個無法切割的整體，每個人的發展都受到這四個系統的影響。生態學理論表明，當中介系統內部或父母與教育者之間存在脫節時，兒童可能會遇到困難。

貳、親師溝通是必要的

許錦雲（1997）、Clark（1999）認為親師關係是奠基於親師良好的交流，為平時就要建立的互信基礎，孩子在學校有行為問題時，責任共同分擔是很重要的，家庭與學校穩定的信任與溝通，而不是發生問題才想要藉由溝通來化解問題。教育的工作是家庭、學校、學生之間的合作事業（王淑俐，1995）。而在臺灣，講到親師合作溝通不外乎就是聯絡簿、給家長的一封信、親師座談會、電話訪問等。而 2017 年的每日頭條中也提醒家長與教師溝通，勿說這三句話：「我家孩子麻煩您多多費費心」、「孩子交給您了，您該說就說，打也行」、「好，我知道了，謝謝老師」。這正好顯示親師需要的是有意義的溝通，如果家長將教育孩子的責任全部移交教師，即使教師想協助孩子，時間長了也會力不從心，唯有親師共同合作才是真正能幫助孩子。而近年許多家長漸漸意識到參與小孩教育的重要性，因而找回以往家長應該扮演的角色，學校也樂於面對這些改變，家長開始以各種形式融入學校，如：愛心媽媽以支援者的角色進入教育現場給予支援、學生家長們組成社團共同討論彼此的想法與建議（許舜為，2015）。

參、學校家庭夥伴關係（SFP）減少學生問題行爲

隨著社會轉型，國外教育更是重視學校家庭夥伴關係對於學生的影響。「學校——家庭夥伴關係」SFP 一詞的特徵是一種關係，包括家庭和教育者雙方有意義的溝通和積極參與，從而促成雙方之間的真正合作（Epstein, 1995; Sheridan, Rispoli 和 Holmes, 2013）。在 SFPS 中，家庭和教育者共同承擔著教育兒童的責任，並且關於兒童的決定是聯合制定的（Epstein，1995）。

如同 Family Check Up 計畫則包含許多學校家庭夥伴關係（SFP）的元素，家庭檢查（FCU）是一個簡短的、基於優勢的干預模型，適用於2至17歲的兒童。旨在利用支持積極育兒的各種材料和服務促進家庭參與。其目的是減少兒童的問題行為、提高學生的技能和家庭互動並增加家庭與學校的關係。FCU干預包括三個階段：一、初次面談。二、家庭的生態評估。三、反饋家長會議。每個階段均由家長顧問指導並與家人進行合作。在初次面談的過程中，顧問會與家人建立融洽的關係，並完成一般或獨特的需求評

估，以了解最合適的服務。家庭生態評估包括一次家訪，可直接觀察家庭的互動和調整，評估兒童在各種情況下（例如：學校和家庭）的適應能力。在第三階段，向家庭提供有關家庭優勢、做法和行為的反饋。在此階段中，家庭可以連結服務和資源。最後，父母選擇繼續建議，其中可能包括簡短干預、家庭治療或基於學校的計劃等服務。而父母也可以參加「日常育兒」課程，學習如何加強育兒技能，了解有關這些技能的更多資訊。FCU 有效性的試驗中，研究結果表示 FCU 有效地增加積極育兒的能力，並減少家庭衝突、兒童問題行為、不良同儕關係和藥物濫用的問題。（Dishion, 2008; Van Ryzin; Stormshak; Dishion, 2012）。FCU 計畫亦改善青少年的自我管理、學校參與和出缺勤（Stormshak, 2009, 2010）。

肆、家長、教師攜手合作將教育發揮最大效力

當家長被通知孩子在學校犯錯時，父母總是憂心如焚，恨不得立刻衝到學校問個究竟，殊不知有時候教師也是茫無頭緒，如果此時父母和教師之間還非得理出個責任歸屬於誰，那不只對於整件事情沒有幫助，對孩子更毫無益處。少數不講理的家長往往「贏了面子，輸了裡子」，後遺症則為家長無法得知的，原本老師的出發點大多以關愛孩子之名，並且出於主動，但事件後心中已有疙瘩，可能再也無法像從前對該孩子關愛如初，親師溝通不良往往會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，其中傷害最大的往往也是最無辜的孩子（伍邵玄，2018）。

在親師溝通中，難免有所摩擦，而此時「同理心」就顯得格外重要，須明白家長有其緊張與無助，教師也有自身無可奈何。在親師溝通中，教師必須善用傾聽的技巧，先讓家長說明想法後，再運用三明治溝通法、訊息等方法和家長進行溝通，減少衝突的情境產生。在教育孩子這條路上，家長和老師是合夥人，應攜手同心。沒有完美的家長和完美的老師，老師和家長就是孩子成長旅途上最重要的左右手，缺一不可（元老師，2019）。

參考文獻

元老師（2019 年 11 月 13 日）。教育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事，老師家長攜手共進，孩子才能真正受益。**每日頭條**。檢自：https://kknews.cc/zh-tw/education/j25yrje.html

木棉麻麻（2017 年 5 月 25 日）。跟老師溝通，儘量別說這三句話，起不到幫助孩子的作用。**每日頭條**。檢自：https://kknews.cc/education/q2q8jvg.html

王淑俐（1995）。**為師最樂：現代師生倫理與溝通技巧**。臺北：南宏。

伍邵玄（2018 年 6 月 6 日）。贏了又怎樣？——談親師溝通技巧【部落格文字資料】。取自：http://blog.udn.com/zimwu0902/112307679

許舜為（2015）。**行動化「親師方舟」App：探索親師通訊結合教育資料探勘之潛力**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）。國立中央大學，桃園。

許錦雲（2008）。幼兒園良好親師關係之探究。**教保期刊**，**1**，13-29。

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, *35*, 227-232.

Bronfenbrenner, U. (1977).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. *American Psychologist*, *32*, 513-531.

Bronfenbrenner, U. (1979). Contexts of child rearing. *American Psychologist*, *34*, 844-850.

Clark, A. M. (1999). *Parent-teacher conferences: Suggestion for parent* [ERICDigest]. Retrieved from https://files.eric.ed.gov/fulltext/ED433965.pdf

Dishion, T. J., & Shaw, D., Connell, A., Gardner, F., Weaver, C., & Wilson, M. (2008). The Family Check-Up with high-risk indigent families: Preventing problem behavior by increasing parents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in early childhood. *Child Development*, *79*, 1395-1414.

Epstein, J. L. (1995). School/family/community partnerships: Caring for the children we share. *Phi Delta Kappan*, *76*, 701-712.

Joseph A. Durlak, Celene E. Domitrovich, Roger P. Weissberg, and Thomas P. Gullotta. (2017). *Handbook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: research and practice*.

Sheridan, S. M., Rispoli, K., & Holmes, S. (2013). *Treatment integrity in conjoint behavioral consultation: Active ingredients and potential pathways of influence*. In L. Sanetti & T. Kratochwill (Eds.), Treatment integrity: A foundation for evidence-based practice in applied psychology (pp255-278). Washington, DC: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.

Stormshak, E. A. & Dishion, T. J. (2009). A school-based, family-centered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substance use: The Family Check-Up.

Stormshak, E. A., Fosco, G. M., & Dishion, T J. (2010). Implementing interventions with families in schools to increase youth school engagement. The Family Check-Up model. *School Mental Health*, *2*, 82-92.

Van Ryzin, M. J., Stormshak, E. A., & Dishion, T. J. (2012). Family and peer predictors of substance use from early adolescence to early adulthood: An 11-year prospective analysis. *Addictive Behaviors*, *37*, 1314-1324.